

新中国的

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

(1949—1959)

李洪河

著

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

中共党史出版社

新中国的

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
(1949—1959)

李洪河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李洪河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199—833—0

I. 新… II. 李… III. 流行病—防治—研究—中国—
1949—1959 IV. R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579 号

书 名: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

作 者:李洪河

责任编辑:黄 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148mm×210mm 1/32

字 数:292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0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99—833—0

定 价:24.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本书承蒙
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序

李洪河博士三年前同我合作，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很虚心，多次约我谈。他有较好的史学基础。我把近些年对史学发展趋势的粗浅看法讲给他，也讲几年来给研究生讲授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课的点滴收获，其中较多谈了跨学科和社会史、现代化研究。洪河觉得有启发。在思索和接触材料的过程中，他发现1950年代疫病的流行和防治是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以往有从专业角度研究的成果，但从社会史的角度做研究的几乎没有。不仅如此，他还在短期内发现了大量材料。当他兴奋地说起这些发现时，我感到，他的研究课题有着落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一成果。洪河邀我作序。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研究，只好说点题外话吧。

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字眼。可能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文明史延续最久的国家，一代代文人留下了比世界各国都远为丰富的史书类文献。也许还由于历史上中国人不信上帝，历史成为国家民族家族存在的依据，也是当权者确立或寻找合法性依据的资源，所以，中国人很重历史。这传统在我们的生活中习以为常：小学有历史课，初中学中国史，高中学世界史，现在大学又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纲要”作为必修课。历史知识成为我们日常最重要的知识，历史学科是我们学术中最有传统和深厚根底的学科，历史学中也最易出大师学者。

然而，对于小学始读《三国演义》（“准史书”？），大学本科专修历史，后来也研究一点历史的我来说，搞清楚什么是历史还真费了许多



年的时间。

记得1979年春节回家度假与朋友聚会,在座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听说我在北师大历史系读书,就向我“请教”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一下把我问住了。学了一个学期的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记忆中老师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是历史”。我自信地中国呀世界呀说了一通,但似乎没有满足问者。也许这事不能怪我,因为直到大学毕业后几年,我才陆续读到《史学概论》一类的书籍。而中国(至少是新中国)史学理论知识结构的建立,大概算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呢。

虽然没学过“史学概论”,却听过“影射史学”及“史学是政治婢女”之类的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清楚记得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会师的名画有一天忽然换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又知道了中国现代史被简化为中共党史,再简化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对于“影射”一词自是颇为不屑。我认为:一是历史研究必须求真,研究者须以真诚的心,下功夫求真实材料,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说真实的话;二是随着社会发展生活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根据人们的现实需要,研究可给人们提供以往未曾有人提供的历史借鉴。前者来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发的拨乱反正的影响,后者来自近30年来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拓展为包含经济文化社会学术诸多侧面而成的全部人类生活史这一学术经历的启发。

李洪河的这部成果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意义。

作为以社会史视角研究新中国最初十年疫病流行及其应对的研究,它不同于从医学防疫专业角度出发的同类成果。它将流行病这件关乎社会的事情和社会组织群体的反响和应对行动结合起来,透视同一时期社会的政治和组织以及人们的意识特点。这类研究对于当下党和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以负责的态度时刻警觉地对待流行病,理性而有组织地应对疫情和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加以防治,力争最大限度减少生命损失和民众疾苦,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作为历史的记录,同时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作者尽可能搜集大量史料来说明问题,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情况,这为当今人们准确地认识历史,把握和吸收真实的历史经验,提供可靠的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引入国内的历史学、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新成果及其展示的人文社会科学新方法,给了我们另外一种观察历史学价值的角度,从而引发历史学科学性问题的讨论。这类观点起始于“历史能否复原”的问难,进而从历史的复杂性、各类记载历史材料的有限性、诸种权力制约下的史料偏颇或歪曲的可能性、研究者的主观性及其在不同环境语境下的随意性、表述话语的随机约定性亦即难以准确清楚稳定地显明所表事物因而被揭示出的“游戏”的特性等等认识的发现,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以真诚求真史说真话便一定出真史一事难以成真。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改变对历史求真的要求,因而也就应当承认历史的科学性,只不过同时要承认历史研究的有限,亦即人的认识有限,同时也是科学自身的有限。

洪河的研究,资料或有不足,分析或有欠缺,论述或有不到,后来者自会品评增补,其不足又有后来者。所愿者,此著能为有关的人们注意,所述说能对当下社会秩序和人生健康的维持有些许作用,著序者之心如此而已。

朱志敏

2007年7月24日

目录

绪论	1
一、核心概念：疫病	3
二、学术研究概况	6
三、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结构与方法	13
四、资料说明	15
第一章 新中国的疫病流行概略	23
一、疫病与疫情	23
二、疫病流行的特征和影响	63
三、疫病之时间分布	84
第二章 疫病发生的社会生态背景	90
一、自然环境因素	90
二、社会环境因素	102
第三章 疫病流布背景下的国家应对(上)： 国家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	136
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积极的应对举措	136
二、国家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168



三、成功的经验分析	189
第四章 疫病流布背景下的国家应对(下):	
爱国卫生运动	197
一、以清洁大扫除为中心的早期卫生运动 (1949—1952)	197
二、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2—1956)	208
三、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7 年以后)	227
四、1950 年代爱国卫生运动的几点经验	238
第五章 疫病流布背景下的社会应对	243
一、一般民众的驱鬼、避疫和防疫	243
二、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	248
三、中国红十字会的防疫行动	259
四、教育界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	269
第六章 疫病应对成效分析	276
一、各种疫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276
二、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	280
三、妇幼保健状况	285
四、民众心理和心态	295
结语	299
附录:新中国疫病流布和防治大事记(1949—1959)	305

参考文献	319
后记	336

绪 论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疫病、战争和饥荒常被称为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它们时常并驾齐驱,肆虐于人间,不仅带给人类痛苦和恐慌,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衰退,甚至于国家的消亡。对于战争和饥荒,历史学家多年以来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学术关怀。但对于疫病及其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联系,人们的注意力还远远不够。事实上,疫病与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及个体的命运密切相关,而疫病史也与一个国家或一定时期的政治史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像猩红热对古代雅典帝国垮台的影响,疟疾对古代罗马帝国衰落的影响,“黑死病”(鼠疫 Plague)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①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曾经着重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②瑞典病理学家韩森(Folke Henschen)甚至断言:“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③如果说麦克尼尔的说法还比较客观的话,那么韩森的断言似乎就有些夸张。但是细想之下,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疫病及其流行实在是影响人类历史

① 参见[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5 页。

②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339 页。

③ 转引自林富士:《疾病史研究刍议》,参见台北中央研究院生命医疗史研究室:<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2004 年 12 月 12 日。



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多年以来似乎只是医学界考量的范畴,在历史学的领域内,很少有人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将其打入另类,列入非主流史学的范畴。^①然而,从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一方面,疫病时时都在冲击着人类社会,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变迁;而另一方面,人类应对疫病的努力同时也在塑造着人类自身的思想与行为。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英国状况》中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②因此,在人类自身的社会生活日益引起学者们更多的反思和关注的学术情景下,对疫病及其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无论在医史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尽管已经能够控制一些急性传染病如天花的流行,^③但自然界各种微生物的衍生与人类社会“恩怨相伴”的关系仍将继续,人类并不能完全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一些疫病如艾滋病、禽流感、疯牛病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肆虐,给文明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在中国,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更不待言。因为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也曾流行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疫病,国家与社会在救治疫病、扑灭疫情

① 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冯尔康“序一”、梁其姿“序二”。英国历史学家卡特赖特等认为疾病对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常常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参见[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也认为长期以来,疫病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常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该书的目录标题。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③ 全球消灭天花验证委员会于1979年12月6—9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举行会议,确认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消灭。参见章以浩、蒋豫图:《全球消灭天花的成就》,《中华医学杂志》1980年第9期。

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虽然我国控制疫病的能力和卫生事业水准已是今非昔比,但各种各样的疫病仍可能发生并流行,甚至还会有新的疫病传入与出现,2003年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猖獗即是极好的证明。因此,了解历史上各种疫病流行的历史,认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国家和社会应对疫病的经验,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所以选取新中国1950年代这样一个时段,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既是现代中国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个充满变动与革命、极富探索与思辨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国家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了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我们国家的许多探索与发现虽然还处于稚嫩的萌动时期,但也蕴涵着众多质朴的思想与智慧。这其中包括国家和社会在救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疫病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进行爬梳和整理的时候,我发现那时国家与社会的许多积极的救治举措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周恩来曾经把历史称作是“民族的记忆”,他认为“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①因此,我从居安应该思危、有备才能无患的初衷出发,希望对这一时期的疫病流行与国家和社会的应对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从中探索出一定的规律,受到某种思想的启迪。

一、核心概念:疫病

何谓“疫病”?在对本书主题进行论证之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楚

^① 《北京日报》1996年4月6日。转引自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3页。



“疫病”的概念。对现代文明人而言,“疫病”应该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究竟什么是疫病?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权威的《新华词典》说“疫病”是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①,《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疫病即所谓“流行性的传染病”^②。二者表面上的解释并无大的差别,但细研之下却可以发现二者之中一个不仅强调疫病的“流行性”,而且强调了疫病的“急性”特征,另一个则仅仅强调了疫病的“流行性”。从我国古代的一些医学论著来看,古代医家们对疫病的认识则更多的是“流行性的传染病”,而不仅仅局限于急性传染病。有学者经过考察,发现我国古代的医学论著中经常有“疫”字出现,虽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从《礼记·月令》:“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丧”等条文来看,疫病的伤亡损害是比较严重的。许慎《说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皆”字说明疫之发病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应该是所谓“疫病”的一大特征。后来有学者对疫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说,如明代的吴有性在其《温疫论》中说:“时疫能传染于人”,“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清代的熊立品在其《瘟疫传证汇编》中也说:“阖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③他们的论述中皆用了“传染”一词,这实际上说明了“疫病”另一大特征即“传染性”。因此可以确定,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伤亡较严重的一类疾病。其包括的病种是相当广泛的,既包括多种传染病,也可能包括某些非传染性流行病。

近代以后,医学界和医史学界对疫病的认识渐趋统一。只要在人类疾病史上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或危害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等,都在广大医家或学者们考量的范畴。当然,也有学者总结了1840—1949年的百余年间发生的危害重大、凶险程度高的鼠疫、霍乱、白喉、烂喉痧等的流行特征,认为所谓的疫病是指外感疫疠邪气所引起的,

① 新华词典编纂组:《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99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94页。

③ 转引自张志斌:《疫病含义与范围考》,《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3期。

具有强烈传染性,易引起大流行的一类急性发热性疾病,相当于现代的急性传染病。^①但是如果仅仅从急性传染病方面来认识现代意义上的疫病,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近代以来一些慢性传染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钩虫病等,地方病如麻风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骨节病等的危害程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建国前就不仅仅对各种急性传染病问题给予关注和研究,而且也对各种慢性传染病、地方病的发病原因、流行规律和防治措施等给予研究。这可以从建国前由中华医学会主办,创刊于1915年11月,影响颇大的医学科技期刊《中华医学杂志》中的相关条目得以充分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于1955年7月5日公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把应管理的传染病定为两类共18种。其中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和天花等。乙类传染病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斑疹伤寒、回归热、痢疾(杆菌性痢与阿米巴痢)、伤寒及副伤寒、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灰质炎、首日眩、炭疽病、波状热、森林脑炎、狂犬病等。^②1956年9月6日,根据中央已把血吸虫病、钩虫病、疟疾、丝虫病、黑热病、恙虫病、出血热等7种传染病列入消灭疾病的规划,卫生部遂将其列入《传染病管理办法》,依法进行管理。^③

其后,有关疫病的范畴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乙类传染病是指: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

① 吴文清:《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史》,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页。

② 《传染病管理办法》,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5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823—827页。

③ 《卫生部关于将血吸虫病等七种传染病列入传染病管理乙类传染病中进行管理的通知》,《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1号。

布鲁氏菌病、炭疽、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丙类传染病是指：肺结核、血吸虫病、丝虫病、包虫病、麻风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新生儿破伤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① 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传染病防治法》，在原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乙类传染病根据实际情况新增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病，并将原属于丙类传染病的血吸虫病列为乙类传染病；新的丙类传染病基本未变。^②

考虑到国家卫生法规所规定的现代疫病的范畴，本书在论述过程中对上述疫病，尤其是在建国初期流行范围较广、传染性较强、病死率较高、危害性较大的疫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一些地方病如布氏菌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等，可能会由于论述的需要也有少量涉及。但从整体上有关疫病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仍是基于现代疫病学的范畴。

二、学术研究概况

关注疫病，关注人的身体，关注人的健康，应该是人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从疫病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视角来从事学术研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9年第1—6期合订本，第1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http://www.moh.gov.cn/news/menu_index.aspx?title=法律法规，2006年5月21日。

欧美学者早于中国学者,^①中国台湾学者又早于大陆学者。^②但如果单纯从医史学的角度来观察,大陆则以陈邦贤、范行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界前辈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创办医史杂志,成立中华医史学会,出版学术专著等,相当活跃。其中,陈邦贤所著《中国医学史》设有疾病史专章,并且首先探讨了传染病史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指出:“传染病史,就是人类和微生物的战争史。”^③该书的第三版增加了新中国防治疫病成就的内容。范行准所著《中国病史新义》积数十年之努力,以西医病名为目,分十三篇阐述每病的认识过程,填补了我国疾病史研究的空白。其中专设有传染病一节。^④其后以李经纬等为代表的医史界学人也对中国疫病史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几乎每一种疫病都有专门的研究论著。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急性传染病如鼠

① 西方对疫病史、身体史和医疗史的关注,产生于晚近,比较早的是法国年鉴学派。这也被认为是年鉴学派最突出的、表现其全景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代表人物布洛克的《国王神迹》,讨论了早期欧洲流行的一个有关国王触摸便可以治愈患者的皮肤病的观念,以及与此相关背景下的王权与神权的对抗问题。(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页中的相关阐述)1965年法国思想家福柯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的缩写本《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版),全面考察了文艺复兴以来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所体现的疯癫对于现代人的意义。1976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中从史学和流行病学的观点,描述了西方的疫病流行及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宗教的狂热和人们社会生活、观念信仰的全方位变乱。近年来大陆学界陆续翻译出版的美国社会历史学家苏珊·桑塔格女士作品之一的《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考察了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及恶性肿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逐渐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很有启发意义。可以说,一段时期以来疫病史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② 台湾学者十多年前就已成立有“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其相关研究状况,可参看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邢义田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内容还可查阅杜正胜等人主持的台北中央研究院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网站:<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

③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4月影印版,第361页。

④ 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版。